



主 编:吴昌勇
执行主编:陈 曦
邮箱:akrbwhzm@163.com
本版编辑:陈 曦
刊头题字:张思成



第4期 总第112期
2021年1月
庚子年十二月十七
星期五

文化周末

WEN HUA ZHOU MO

乡土,自然的纯美与诗意的涌动

——现实乡土与文学乡土阐意

叶松成

安康至今没有厚重的乡土文学产生,这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在对乡土文学的谋划上,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构架,缺乏大手笔的胸襟和气度……没有勾画何来的激情,没有播种哪来的收获!



申小荣 作

中国是一个乡情浓郁的国度,这不只是我们有八亿多农民,而是在漫长的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,我们的吃穿住行,我们的文化积淀,都与农耕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土地是物质的,也是精神的,而乡土情怀则是驻留在土地上的永恒魂魄,耕种土地其实就是耕种乡土,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而言,乡土是可以触摸的,它是按在手心里的丰裕,是融入眼里的金黄……土地对于中国人而言,是一个广袤、深厚的概念,它是对乡土的延伸、容纳,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版图还有尊严。

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是维系乡土的纽带

费老说:“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,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。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,飘忽不定;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,迁移无碍;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,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,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,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。(《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,2018年10月,商务印书馆)”)人一旦和乡土结缘,就会世代坚守和延续下去。人口是在土地上繁衍、茁壮或凋谢的,但真正的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关系的确立,则系于乡土,系于那个一代代、一茬茬耕作劳作的乡村世界。“血缘”是亲情,是人与人的纽带,它包含了历史和文化的因子。“地缘”是靠“血缘”来认领的,它必须依附于“血缘”;“血缘是稳定的力量,在稳定的社会中,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,不分离的。(《乡土中国》)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是维系乡土社会的粘合剂,没有“血缘”何来的“地缘”?乡土社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的社会,它应该是扰攘的、繁杂的、鸡零狗碎的,这里面充斥着人性的温暖、人情的关怀……

乡土社会是与土地共休戚的,这不只是生死相依,命运相托,而是土地将一种精神禀赋的东西烙在了人的性灵上,于是汗味、酸味乃至土腥味,构成了生命的气息,当然,还有挥之不去的惆怅和倏然降临的悲苦……乡土社会植根于土地,这就决定了人和五谷杂粮一样有自己的生长期和归属期。乡土是牵挂也是牵挂,离乡背井或许只是为了寻觅短暂的憧憬……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”。贺知章三十八岁中进士,年逾八旬才回归故里,此时的他步履蹒跚,鬓发斑白,老眼昏花,物是人非,一切都变了,但唯一没有变的,是他那一口地道的“乡音”,这是亲情也是“血缘”,官场上的勾心斗角,人世间的冷暖哀愁,增添了世故,却丝毫未减损那潜伏在记忆里的原初本色……乡土呵,就像站在村头老槐树下的母亲,任何一个顽皮的孩子,只要听到那一声声呼唤,顿时就会野性收敛,匆匆回来。

因此,少小离家,鬓生霜雪,最后还要叶落归根;而死于异域,骨殖却要葬回故乡……乡土社会没有高贵,只有朴素;没有华丽,只有本色;没有倾轧,只有回报。“血缘”缠绕着“地缘”,鸡鸣狗吠,聚族而居。日落而息,日出而作,无论贫瘠瘦弱,对于土地上的收成每个人都抱有一份崇高的期待。人和土地的对话是由生到死的过程,土地收回一个生命,大地就多了一抔黄土……

懂得了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,你才懂得了乡土,懂得青绿抑或是金黄,它所涂染的不再是一种颜色,只有来自心灵中的谛听,才能感触到乡村田野的呼吸吐纳。在宽阔厚实的土地上,属于乡土的只是一隅、一个杳见,它可能逼仄、偏僻、冷落,但是当你的祖辈,在某一天

的一个黎明或是黄昏来到了水边、草泽、荒原、山坡,于是筑草庐而居,从此这个意味着“乡土”的地方,就有了一个家族的固守、延续,就有了开垦与收获,就有了房前的阡陌田畴,房后的四季桃李……乡土很小,但很重,只有乡土能深藏人的记忆,能发挥人的情怀,能抚慰人的忧伤。乡土的粗糙,可以刺痛你的手掌;乡土的季风,可以穿透你厚厚的衣衫,这是朴实的归属感,是自然留给人类的最纯美的遐想。

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对文学乡土的影响

脱离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的乡土是不存在的。乡土是土地的无数个拼块,这无数个拼块上的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,构成了五千年农耕文明的经络。走出去又回来,人永远被经络牵引着,束缚着、维系着……是的,乡愁是大于乡情的,但不可否认,乡愁中所萦绕的那一缕芬芳无不是从乡土中散发出来的……乡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沃野、诗意的清流,于是,在文学的世界里,乡土情怀一旦介入,那些平淡的文字,瞬间就会摇曳生姿,那些直白的情节,突然间就会荡气回肠……从这里开掘下去,中国的文学便有了活气与生气,文学的画廊就有了新的风韵和姿态:刘姥姥、阿Q、闰土、翠翠、梁生宝、白嘉轩、许茂、陈奂生、高加林、孙少平……这些人,他们带着各自的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,在乡土的舞台上演绎着人生和命运的进行曲。高尚与卑贱,阳刚与懦弱,赋予了他们的秉性和色彩,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精神内涵,但他们对生命意义的刻画,则是一样的伟岸、潇洒。文学乡土的成功,说到底还是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揭示的成功,人物

的可感性、深刻性、丰富性,皆取决于“血缘”和“地缘”的纠合、互渗,用通俗的说法,那就是人物所具备的“土性”是否存在,是否在土里扎下了半个身子。如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中的许茂,他的自私、偏执甚至冷酷,这一切其实都只是表象,他的骨子里一直自觉或不自觉地伸展着一个父亲的羽翼,他想保护他的孩子们,但这种保护是绝对的农民式的,是一个小生产者狭隘、胆小的具体表现,更是一种纯净的乡土“血缘”自在的奔流。《平凡的世界》中的孙少平,他一心要走出双水村,他向往城市,想通过奋斗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和身份。孙少平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,但他却没有从根本上完成蜕变,他的淳朴、正直、节俭,这些融入骨髓的性格因子,是古老的黄土地所馈赠的,它犹如一种遗传基因,改变不了,这也即是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的影响,而那种诗意的涌动,又使他迫切地想挣脱“地缘”,向往远方。

文学乡土中的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,考验着一个作家对乡土的认识和领悟;诗意的涌动,来自一种真性情的触发,它不会凭空产生,这种孵化带有一种天然的自觉。事实上,真正的乡土作家,他们身上首先刻印着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的齿痕,他们与乡土本身就有一种血液于水的关系。于是,笔下所思所想,其实都是从灵魂中抠出来的,是自己的心灵史、情感史、家族史。如周克芹、路遥、莫言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等,他们皆是这样的作家。因为“血缘”,也因为“地缘”,一些人的作品往往带有自传的味道,那其实是作家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,不期然地融合了,他们相遇在一个诗意的王国,灵魂与肉身走在了一起……或许正是这个原因,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乡土,才有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域,文化重建、价值体系重建,而发展也必将带来新的问题和矛盾,这一切都充满着太多的未知,它挑战着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因此,新的乡土留给文学的是一片宽广无际的山野——自然的纯美与诗意的涌动召唤着我们,对于安康作家而言,是该出发的时候了!

座又一座丰碑的挺立!

新的乡土召唤着一种新的文学表达

二十一世纪,文化的多元性,完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观念,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,传统的束缚被剪除了,想象的翅膀可以在广阔的空间任意翻飞。而对于发展和前行的乡土文学,这时则面临着新的定位,有两个因素必须考虑:一是作家对新世纪乡土的认知程度正在退化。边缘乡土、泛乡土写作,消解了传统乡土文学厚重的底蕴。本色的乡土作家,或者说具备真正的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情怀的作家,已是凤毛麟角。二十世纪初期、中期乃至后期的乡土文学,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范本和标杆,而最有说服力的证词,那就是这些作家对乡土的“研读”不是来自间接的经验,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从乡土中走出来的,身上沾满了草屑和泥土,如孙犁、赵树理、高晓声、路遥、贾平凹、陈忠实等等,骨子里弥漫着一种天然的泥土气息。二是新世纪的乡土已出现了变异,这种变异是否定之否定的变异。我们其实清楚地看到,传统乡土与新世纪乡土的距离正在被拉大。随着农村经济、文化的日益繁荣,城乡间的差别越来越小。农民已告别了土里刨食,靠天吃饭的生存困境,科技带动产业的力度加大,致富门路拓宽,政策的优惠和倾斜,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农民收入的稳定,农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一天增强。农民在中国大地上像雪一样一点点被消融掉了,困扰几千年的温饱危机、生存危机,在共产党手里彻底解决了。这就是新乡土的变化,它是飞跃,也是质变。这样的乡土书写,与早期的乡土文学,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新乡土,要求我们的作家必须具备新的识辨、新的体悟和新的发现。从乡土上再回到乡土中去,这是早期的乡土作家所追寻的路径,它不一定就适合于当下的环境。但生活不是写在纸上的,新的乡土,需要我们的作家真切地、用心地去体验,带着情感、带着体温融入进去。著名评论家谢有顺谈及乡土文学时说:“乡村是熟人的社会,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;城市经验高度相似,乡村经验却极富差异性。没有经验的差异,就没有个性的写作,也没有独特的想象。《小说的心事》,2016年1月,作家出版社”强调“个性”,就是要体现最本真的东西。早期的乡土作家有着天然的“血缘”与“地缘”的情怀,这对于当下的乡土作家不能不说是一个劣势,但只要我们有心,仍然可以找到依附的“地缘”并重新建立一种稳固的“血缘”,从这个意义上说,作家要自觉进入乡土情境,开掘乡土内核,并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,这样才可能写出让自己满意,让读者心跳的作品。

安康至今没有厚重的乡土文学产生,这是因为我们的作家在对乡土文学的谋划上,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构架,缺乏大手笔的胸襟和气度……没有勾画何来的激情,没有播种哪来的收获!安康的乡土资源很丰厚、很宽阔,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,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看,它已完成了孕化和积淀的过程,只待切入、开垦的犁铧,这即是安康乡土文学的优势,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,这种可能性不是碎片式的记录,而应该是具有史诗性的宏大而深邃的篇章。

新的乡土,是对传统乡土的告别,这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域,文化重建、价值体系重建,而发展也必将带来新的问题和矛盾,这一切都充满着太多的未知,它挑战着我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,因此,新的乡土留给文学的是一片宽广无际的山野——自然的纯美与诗意的涌动召唤着我们,对于安康作家而言,是该出发的时候了!

虽然我已记不清什么时候结识《安康日报》的,但“安”字的草书写法,我是模仿《安康日报》报头来练习的。读小学的我,并不认识草书的“安”,在得到老师教导后,我便仔细端详《安康日报》四个大字,先用手指比划再用铅笔和钢笔反复模仿练习一笔安的写法,起先有点儿歪歪斜斜,很快就笔顺流畅而一气呵成了。

在西安读大学时,每每看到校园报栏里琳琅满目的报纸总会驻足浏览。《新民晚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今晚报》《西安晚报》等等,自那时起便养成了浏览报纸的习惯。我想故乡安康要是也有一份《金州晚报》那该多好!那时的我年少轻狂,甚至萌生过要写信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念头,好像创办一份报纸就跟我们系里办一份油印的简报那么简单。随着自己阅历的加深,知道办好一份报纸是多么的不易啊!好在《安康日报》经过扩版,现已形成一报五刊且有数字报纸和微信公众号的大格局,也足以安慰一下我年少的冲动。

作为一位略识之乎的文化人,工作之余浏览《安康日报》成为我几十年难以舍弃的习惯。无论是副刊“瀛湖”里的散文诗歌,还是后来《科教周刊》和《文化周末》的师生习作及文化小品文,总是倍感亲切,总是认真拜读,细细品味。

报纸的副刊在我看来就是报纸文化底蕴的生动体现,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份报纸文化品位的象征。《安康日报》的瀛湖副刊在众多报纸副刊中也是很有特点的。一是有浓郁的地方特色,很多文字质朴冲淡,叙写本土的山川大地和故乡人物,读来倍感亲切自然;二是精准雅致的文化定位。发表的众多作品体现了编者立足安康,放眼全国的办刊宗旨。从“瀛湖”走出的很多作家,其作品也是反响强烈,十分耐读的。其中李春平老师的小小说,李小洛老师的诗歌,黄开林、吴昌勇、梁真鹏等老师的散文本人关注较多。希望安康能有更多的作家从这里翻越秦岭走向全国。三是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。每每读到副刊推送的文字,总能让人感受到秦巴子民对这块大地的挚爱,还有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浓浓的乡情。

我很喜欢副刊里的“百姓茶坊”,里面的文字既贴近时代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实际,读后也让人受益匪浅。步入社会后,常常回想大学时光。于是我萌生了写“同窗系列”记人散文的想法,并非鲁莽地投通瀛湖副刊编辑李亚明女士的电话,她给了我很多中肯的建议,但苦于后来琐事缠身,涂鸭了数篇之后难以以为继,这个愿望也就如此搁浅了。

《安康日报》之于我可谓亦师亦友,风雨同舟。一直以来,我把《安康日报》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。在这里我不仅可以倾诉,也可以倾听,这是一个学习的园地,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。我一方面经常翻阅纸质报纸,再就是上网浏览数字报纸,关注公众微信号。偶然也有心血来潮之时,给报纸投稿。虽然文字拙劣,思想性不强屡遭退稿,但我依然保持着对文化安康这一特殊载体的关注和热爱。有时自己涂鸭的数篇短文得到编辑的首肯并发表。1995年,习作《便条回忆》在“瀛湖”版发表,给了我很大鼓舞。2004年,习作《怀念听风斋》在“瀛湖”发表后,姜学斌老师以《心灵交响风雨声》为题予以评论,更让我感动不已。后来又陆续发了《多彩山城》等豆腐块文章。2017年由《安康日报》发起的“生态安康”春联征集活动,我撰写的春联荣获“最佳春联”,获得了千元奖金及荣誉证书。

光阴荏苒,岁序更迭。社会在变,思想在变,我们阅读报纸的方式也在改变。报纸的编辑也换了一茬又一茬,但我对《安康日报》的那份情感却始终不渝。那份未了情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浓厚,这种情结难以割舍,因为这是一种血液于水的特殊情感,饱含着游子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深眷恋和祝福。

难以割舍的情结

我和我的《安康日报》

李渔村

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



仙人掌 曹骏楠(6岁)作



机器人 曹骏楠(6岁)作



兔子 寇奕萌(7岁)作



山水 寇奕萌(7岁)作



山水 寇奕萌(7岁)作